

《清集簿录》序言

戴 逸

1982年夏，为要了解清代书籍、史料、档案的存佚、整理情况，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四位同志到南方各省进行局部地区的调查。他们回到北京以后告诉我，听湖北省图书馆的同志介绍说：北京有一位同志，以业余时间研究清人诗文集，孜孜不倦，搜罗极广，伏案著录，已达十年。这个消息引起我极大的兴趣。经过打听、查找，终于找到了这位同志，他就是人民日报图书馆的柯愈春同志。

我对此很感兴趣，这是因为我治清史多年，接触了一些清人诗文集，知道其内容的丰富与可贵，对于清史以及中国文化遗产的研究甚有价值。清人诗文集，浩如烟海，分散度藏各地，有些还是未印行过的稿本、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珍贵的书籍，不免水渍虫蚀，霉变损坏，正从人世间佚失。我十分希望对这笔浩瀚的文化遗产进行调查、摸底，以后进一步整理、辑录，但此项工程极大、非少数人、短时间所能成，没有想到柯愈春同志独自一人，并以业余时间，已在从事这一工作，其坚韧不拔、勤奋刻苦的精神，实可令人敬佩。

以后，我和柯愈春同志多次晤谈，听他讲了编写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并阅读了部分初稿。此书搜罗广博，编次有序，著录明晰，叙述扼要。我将他的部分初稿和其他同类书籍粗略地作了

比较对照，柯愈春的成绩远远超过同类书籍之上。

我以前一直弄不清楚存留在世的清代文集究竟有多少？五十年前，王重民先生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仅收书428种；张舜徽先生著《清人文集别录》，收书670种，其自序称“所得寓目者，才一千一百余家”。郑振铎先生性好聚书，节衣缩食以至典物举债，竭力搜求，所得清人文集八百多种，并多次慨叹收藏清集艰难；陈乃乾先生从清人文集中录成《清代碑传文通检》一书，所见清人文集极多，他说：“南北各大图书馆所藏的清人文集，当在三千种以上。”徐世昌所辑二百卷本《晚晴簃诗汇》。是迄今最宏富的清人诗选，收诗人6100家，应是接触到了相当多的清人诗文集，孙殿起的《贩书偶记》与续编，著录清人文集约有四千种；《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别集1685部，加上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所收2890部，两者合计为4575部（其中尚应剔除辑录古人的散文文集及重复著录者），邓之诚先生去世前一年，撰成《清诗纪事初编》一书，据他本人所藏顺、康时诗文集，著录作者六百人，所写介绍多有得之言。关于清集数量最多的记载，是东莞伦明，藏清人集子，几乎达到万种，不到三十年，都转卖散失（《周叔弢六十生日纪念集》）。这一记载是否确实，有待查考。外国人也早已注意到了清人文集的价值，七、八十年前，日本有位藏书家搜集清代顺康以至嘉道时期的集子很多，有“清诗万卷楼”之称（叶德辉《藏书十约序》）。日人西村元照于1972年编成《日本现存清人文集目录》，收录诗文别集²650余家。

以前，已有不少人对清代文集进行收集或著录，而柯愈春同志的工作，自1972年正式开始，迄今已十八年，他寒暑无间，辛勤劳动，白天上班，夜深人静，或节日假期，别的同志正在休息游览，他却怀抱遍览清代别集的宏愿，独坐书城，目索手抄，著录存世的清人诗文集将及一万六千家，辑成《清集簿录》一书，所

得远远超过了前人。他按作者生卒年代排列，其中有的人数种、十数种以至数十种书，如按种数计算，现存清人诗文集不下数万种。真是浩瀚广博，洋洋大观，使我们得以探测清人别集的全貌，为学术研究提供可靠的线索和丰富的资料。

诗文集，亦即古代目录学中所称“别集”，是由个人的作品结集而成，通常包括论文、散文、游记、序跋、诗词，有时也包括奏疏、书信、公牋等等。一个人所著各种内容、各种体裁的作品几乎都可以纳入别集之内。马端临《文献通考》将别集析为诗集、歌词、奏议三门。乾隆间修《四库全书》，馆臣以为“奏议皆关国政，宜与诏令并为一类，不宜别之于集”，于是移奏议入史部；又认为“歌词体卑而艺贱”，亦从别集类分出，而另立词曲类。

个人作品的结集，始于汉代，现存最早的《扬子雄集》、《蔡中郎集》、《诸葛亮集》、《曹子建集》、《嵇中散集》都是后人掇拾遗文补编，非作者自编或当时编成。自编诗文集始于江淹及萧衍父子，唐宋以后，编纂文集之风大盛。不少学者和藏书家也注意到了这类书籍的价值，有意识地收藏或著录前代及本朝人的诗文集。宋僧文莹收宋初至熙宁间文集二百余家；清初曹溶撰《静惕堂宋元人集书目》，载宋人自柳开以下一百八十家，元人自耶律楚材以下一百十五家之书。清初，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张自烈均注意收集宋明人文集，吴之振家产富裕，所得尤多，合吕留良所藏，刻成《宋诗钞》，收录诗人百余家作品，张自烈藏书三十万卷，其中明人文集很多。

诗文集之所以受到重视，正因为它有独特的价值。诗文集反映个人的思想、知识、行为以及所见、所闻、所感，上至军国大事，下至身边琐事，包含的内容很广泛，既是丰富的历史生活的记录，又是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宝藏。由于作者众多，他们的出身、地位、经历、职业、思想以及居住和活动地区不同，而诗文

集中所收，或为文章，或为诗词，或为奏议，或为书信，所以内容的涵盖面十分宽广，涉及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社会历史、经济文化、民情土风以及许多人生活、思想的各个方面。

前人也有瞧不起文集的，认为文集的内容“参差庞杂”、“后世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优之文，亦泛滥横裂而争附别集之名”（《文史通义·文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认为除了少数人的文集，其余均可淘汰，因为“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不过数十人”，又认为“有明以后，篇章弥富，则删薙弥严”，理由是“阅时未久，珠砾并存”（《四库提要·别集序》），基于这种认识，四库所收明人别集只有二百部，而清人别集，除皇帝的御制诗文外只有四十部。

固然，文集数量很多，其价值高下各有不同，应作具体分析，但四库全书之所以“删薙弥严”是从卫道者的立场出发。在他们看来，天地间的圣贤就那末寥寥数人，天地间的道理也只有儒家经典上所说干巴巴的几条，其他的人物和言行都不关重要，没有传世的价值和必要。意见多了、思想活跃反而莫衷一是，有碍圣道，这是卫道者的逻辑。尤其是他们认为异端旁门的作品更是摒弃排斥，如一代才人汤显祖，被认为“才与学皆不逮”，风靡晚明文坛的公安派被认为“矜其小慧，破律而坏度”“相率而趋纤仄……论者比之诗妖”，思想界的怪杰李贽更是“狂悖乖谬，非圣无法……罪不容诛，其书可燬，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别集类和别史类，存目）。所以汤显祖的《玉茗堂集》、袁宏道的《袁中郎集》、谭元春的《谭友夏集》只列存目而不录其书，李贽的诗文则在存目里也找不到。四库馆臣们囿于时代的偏见，看不到在大量的诗文集里所包含的珍贵思想和史料、丰富的民情和风俗以及人们真实的悲欢离合的感情。

更多的学者文士重视诗文集的价值，如顾炎武晚年，曾经自编诗集十二卷，诗中都有记述史事的自注，准备日后交给他的朋

友王炜，他担心王炜不重视，亲自对他说“此史也！”可惜这个本子没有传世（王炜《鸿逸堂稿》），现存的《亭林诗集》是顾炎武身后由他外甥徐乾学提供的。徐乾学是清朝显宦，对于涉及时事的原诗和自注，必多忌讳，当有大量删削。黄宗羲则说过“以诗补史之阙”，杜浚也提出“诗可正史之讹”。譬如清代顺康雍乾时代发生许多次科场案、文字狱，大批官吏、知识分子遭到杀害或流放，许多案件的始末，正史中很少涉及，在别集中却有详尽的叙述。又如民间疾苦，人们耳闻目睹、感受极深，写得很生动深刻，汪洪度的《菜人市》，诗序说：“岁大饥，人卖身割肉于市，曰菜人。有客此乡者，赘某家，其妇忽持钱三千与夫，劝速归，已含泪而去。客不言，寻复踌躇，迹妇所往，已断手臂悬菜人市矣。向所持钱，乃以身售价助夫归途费者。”康雍间的诗人金埴描写监狱中的黑暗惨酷，其《哀东狱》诗序中说：“埴尝过山东州县，稔闻狱卒率以闸版拘囚人，于夜终夕不令转侧，罪之轻重勿论也。”如果将这些诗歌汇编成书，那将是反映社会弊端和下层生活的触目惊心的历史图幅。还有清代有很多官吏文人被流放到东北、新疆或其他边地，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不废吟咏翰墨，将自己惊险坎坷的遭遇，哀怨悱恻的情感，奇特新鲜的见闻写成诗文，从中可以领略塞上雄浑壮阔的山林草泽，认识到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深重苦难以及边疆地区的劳动和斗争生活。

诗文是一种很好的史料，可以证史、补史。如康熙时，郭琇参劾明珠余国柱，这是当时的重要事件，但《清实录》内未载郭琇的劾疏。蒋良骥编《东华录》，从郭的《华野集》中录出补入。又如郑成功坚持抗清斗争，清军造船备战，百姓苦于工役，吴嘉纪的《邻翁行》中写道：“闻道沿江防敌兵，造船日夜声丁丁，工师困惫不得歇，张灯把炬波涛明。监使还嫌工弗速，如霜刀背鞭皮肉，内烂肠饥死无数，抛却潮边鲍鱼腹”。形象地描述了清廷对人民的役使和虐待。又沈德潜的祖父沈钦圻的集子内，

载《秦良玉遗像诗》，诗中说：“勤王兵残势穷蹙，子丧弟死一身独，连斩六贼力已殚，拔刀自刎身不辱。”秦良玉与张献忠战于四川，原来良玉是在“子丧弟死”的战场败境中自杀身亡的，与后修《明史》说她病死于家完全不同。沈钦圻与秦良玉是同时代人，他的说法应较可信。

清集同前代的别集一样，大部分已亡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总序中叙述历代别集亡佚的情况说：“隋唐志所著录，宋志十不存一，宋志所著录，今又十不存一。”据柯愈春抄录方志所载清集书目，发现目前未见存世的，亦多至十之八九。清集大量亡佚，究其原因大约有三：一是自然淘汰。有名的诗人文士或有钱的达官贵人，他们的集子容易刻印。一般知识分子即使编写成集，很难刻印，故很多集子只有稿本、抄本，没有行世，便已亡佚。二是朝廷禁书。乾隆朝编修四库全书的同时，禁毁大批书籍，种数几乎与四库所收书相等，其中大量是“国初人伪妄诗文”。有些诗文集，朝廷并未禁毁，但作者的后人恐内容有违碍，惧怕招祸，自行焚书毁板。三是毁于兵燹。清中叶以后，战争频仍，如川楚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各地少数民族起义，还有历次的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社会动乱达一个半世纪，战争中被毁的书籍也不在少数。

将清代文集中有价值的部分钩稽辑录，分类编次，提供利用，这是古籍整理的一项任务。郑振铎先生在《清代文集目序》中早就谈到：“专治一经一史或一专门之学者，其亦必将有取于斯无疑也。辑序跋，则可自成一书；辑碑传，则可补缪、闵诸集；收诂经之文，则可成一弘伟之诂经文钞；录论史之作，则可集为史学史之资料。大抵竹头木屑，无不有用。”实际上这一工作早就有人在做，魏源为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所辑均清人文章。当代如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张玉兴编《东北流人诗选注》，都是从清人的

诗文中搜寻和甄选材料，分门别类，录编成书的。

柯愈春同志半生精力尽萃于《清集簿录》一书，这是一项巨大而有意义的工程。还有一点值得提到，他从方志艺文、公私藏书目录、清人笔记日记及诗话等书中录出大量清人别集，并全面调查我国各地图书馆所藏的清集，在进行这番追踪寻迹，比勘核对的工作后，大体弄清了清代诗文集存佚情况和庋藏地点。这种方法在《隋书·经籍志》中已开其端，柯愈春将其运用于此书，不但便于我们寻踪利用，也使我们对清集现存的情况，有所了解，因而增加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清集簿录》中叙述多而议论少。作者谨慎立言，本来没有什么不对。但本书还有一个引导读者利用清集的任务，如能对书籍的源流、内容、形式、作者的经历、思想作更详细、准确的分析、介绍，那就更好了。当然，这样的要求，工作量就要大大增加。柯愈春只有一个人，而且业余从事于此，条件又有许多限制，仅将清代别集眼过手摹一遍就需要艰巨的劳动和坚毅的恒心。《清集簿录》已为进一步的整理、利用打下良好的基础。我相信：在这一基础上，柯愈春同志和其他学者们将会继续前进，为发掘清代诗文集这一丰富珍贵的历史文化宝藏做出贡献。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